

# 试析非洲地方 民族主义的演变

李安山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非洲研究中用“地方民族主义”代替“部族主义”更为合适,并对地方民族主义作了如下定义:“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 and 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作者对独立以来非洲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进行了探讨,着重分析了殖民主义遗产、国家政策的实施、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国家政权的弱化等方面的因素。作者指出了非洲地方民族主义发展的四种可能性。

**【关键词】**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非洲政治;非洲民族主义;非洲地方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李安山,1953年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871)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1)05-0044-06

世界历史的演进表明,除了个别的单一民族国家外,任何国家的民族一体化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以近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为例,民族一体化经历了近百年的过程。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期,荷兰有2~3个族体,英国和爱尔兰有8个,法国也有8个,丹麦王国6个,撒丁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各有2~3个,西班牙有5个。今天,欧洲(如英国和西班牙)和亚洲(如土耳其和斯里兰卡)的一些地方民族仍在为民族自治而努力。

在非洲,地方民族主义是一种较为突出的现象。地方民族有的正被国家民族一体化过程吸收,有的在不断演变。在特定条件下,地方民族主义可转变为一种破坏力量;当地方民族主义恶性膨胀时,便成为国家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 and 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

## 人为的国家:地方民族主义的温床

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可说是下列三大势力的结果:反殖民化、革命以及外力干预。”政治独立为非洲带来了新的局面和机会。然而,非洲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是殖民主义统治的产物,如地理的政治形状、官僚政治和司法制度、专职军队和民族构成。这种人为的民族国家独立后产生了各种矛盾,民族矛盾即为其一。在继承殖民遗产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客观条件(独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框架和相对正常的国际环境)和主观努力(领袖人格和才能与国家的积极政策)的良性互动,才能避免民族冲突。

有些国家比较幸运,殖民瓜分并未从根本上破坏原有政治地理,原族体仍留在一个殖民地内。这样,独

转引自[苏]柯毕夏诺夫:《非洲的民族、宗教和语言》,载《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

这是本文作者初拟的定义。我国有的学者用“部族主义”来形容同一现象,作者认为“地方民族主义”一词更为合适。参见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研究中的“部族”问题》,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立后的民族国家内大部分居民语言文化同一或比较接近,宗教信仰又基本相同,民族一体化过程较为顺利。这些国家主要有三类:一为北非国家,其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二为岛国,如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塞舌尔等国。三为在殖民地瓜分过程中幸运地保留了一个主体族体的国家,包括赤道几内亚、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等国。以上国家约占非洲国家的 1/4 多。

其余国家继承下来的殖民遗产要复杂得多。“国家”与“民族”形成的两个过程并不协调。以尼日利亚为例,尼日利亚民族是指由西部约鲁巴族、东部伊格博族、北部豪萨-富拉尼族和其他民族构成的国家民族。将多个民族整合成国家民族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它需要两个层次的认同:个人对主权国家尼日利亚的认同;地方民族认同于尼日利亚民族。第一层次是个人认同身份的扩展,即从习惯上认同自己的伊格博人、约鲁巴人、豪萨-富拉尼人到承认自己是尼日利亚人。第二个层次是指各地方民族逐步放弃自己的文化优越感,致力于国民文化、国民意识的培养,与其他民族分享资源,平等地生活在尼日利亚民族的大家庭里。这个过程意味着将地方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整合到更具代表性的共同体之中。当然,所谓的“更具代表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国家完全负起对每个公民的责任。只有负责的国家政权才能得到地方民族的认可。

多民族并存于一国是人类发展中的自然现象。非洲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局面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殖民统治的恶果。独立前夕,“分而治之”的后果即充分体现出来。一些民族教育程度较高,政治上相对活跃。以乌干达为例,在 1956 年的调查中,乌干达国民大会党 40 个支部主席中,50% 为巴干达人,9% 为阿乔利人,11% 为兰吉人,7% 来自布索加和特索地区;在中央委员会中,17 名为巴干达人,1 名蒙尼奥罗人,1 名穆索加人。在独立后的选举中,各政党对支部领导权的控制倾向于地方民族化;大部分国民议会的候选人也是在他们所属族体占统治地位的区域竞选。这样,在殖民统治后期政治上活跃的地方民族很自然地在独立后的国家政体中占据优势。

## 地方民族主义演变的内部因素

权力和利益有直接关系。独立后非洲国家的权力分配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掌握实权意味着占有

资源、机会和利益。占据政治职位不仅为个人带来权利和利益,也为其所属地区和民族带来荣誉和好处。对于任何地方民族而言,被排除在权力范围之外的代价(甚至危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一旦这种排除超出可容忍的限度,反抗和动乱不可避免。权力与利益两者关系成正比,权力愈大,利益愈多;掌握的可分配资源愈多,以此换取的权力也就更大。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互动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政治领袖的权力为本民族获得更多的利益,本民族支持他获得更多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对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十分不利。在多民族的国家,这种互动能使政治家失去其他民族的支持。

为何非洲的政治家会如此熟练地运用地方民族主义这块王牌呢?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统治者都愿意保住自己的权力,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将自己的政治对手毁灭。同时,只要存在其他途径,任何统治者都不愿公开镇压对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找到某种政治借口。“部落主义”(tribalism)成为了他们的武器。所有对“部落主义”大加鞭撻的政权几乎都是腐败透顶的政权。有时,统治者为了保持对局势的控制,甚至有意激化或制造民族矛盾。

以卢旺达为例,1990 年胡图族贵族政权日益腐败,经济恶化,胡图族和图西族均要求改革。卢旺达政权处境危险。流亡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准备打回国内以夺回权力。卢旺达的边境军官在卢旺达爱国阵线进攻前两个星期向政府提出警告: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部队将从东北边境入侵,但他没有得到所要求的增援部队。政府似乎在等待合适时机来重组权力基础,并不惜用民族冲突的代价来达到目的。在爱国阵线进攻后 48 小时内,政府拘捕了约 1 万图西族和胡图族反对派,并在没有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将他们囚禁数月。他们成了支持爱国阵线入侵的“帮凶”。史学家艾莉森·德斯·福吉斯曾在卢旺达收集口头史料,后来卷入到人权组织的活动。她在与卢旺达难民谈话时发现,一些谴责屠杀的人自己也参与了屠杀,因为那是分配的任务。镇长告诉辖区的人:他们在 1990 年

Vicor A. Olorunsola, e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2, p. 120.

10月的任务就是杀图西人。换言之,一个组织有效的政府组织了一场有效地杀害自己公民的行动。目的只有一个:挑起民族仇恨以转移公众对政府的不满。

由于国家是人为的国家,力图维护本族体或地区利益成为各政治领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在民族内聚力尚未达到足以整合地方民族的国家尤其如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尽可能争得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权力。各地方民族力图控制各级行政管理或国营企业中的职务。在某一民族占优势的地区,本族人往往控制着绝大部分职位。如果一个国家各民族经济上平等,它们的分歧比较容易消除。只有在自然资源分布不平衡而财富的再分配又不平等的国家,民族问题才会变得突出并转变为用来增强本民族利益的保护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有两种情况。在缺乏凝聚力的国家,权力持有者力争本民族的利益。除了在国家计划上尽量满足本民族的需要外,他们还力图将本族的亲信安置在公共企业的董事会,将贷款给予本族人,并尽可能地掌握各种重要设施的控制权。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在1964~1965年间就尼日利亚铁路公司等问题出现争执。各个民族也经常争夺有限的发展项目和年金分配,如在1962~1968年的尼日利亚国家发展计划中,各地方民族就钢铁企业建厂地点展开竞争。还有一种情况,中央在进行整体规划时,力图综合全国需要、地方民族特点和技术性因素,然而,地方民族主义者不满中央的政策,力争自身利益。乌干达于1964年为建造纺织厂选取厂址,阿乔利和兰戈均在考虑之列。兰戈的首府利拉被选定。政府的依据是:利拉有充足的水源和可供使用的设施;兰戈生产的棉花大约是阿乔利的2倍。阿乔利人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他们派出代表团去据理力争。

对权力的控制可以影响到各种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利益,这包括本族人对行政和企业职位的占有、制定对本族有利的法律以及各种社会职务和社会荣誉的获得,而这一切往往最后都从经济利益上体现出来。作为殖民遗产的民族间的不平等也在独立后的经济方面体现出来。肯尼亚的基库尤人男性占全国男性人口的20%,但在肯尼亚工商发展公司(ICDC)对各种贷款的发放中基库尤男性公民得到的贷款数却远远超过人口数的比例。到1966年为止,基库尤男性公民得到的工业贷款为64%、商业贷款为44%。

地方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民族,国家文化

教育政策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至关重要。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招生的民族比例等因素决定着国民文化的建构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取向。1964~1965年间,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曾就尼日利亚各大学民族构成比例出现争执。乌干达的兰吉民族主义者曾对在兰戈的小学使用阿乔利语表示不满。埃塞俄比亚的奥莫罗人占总人口的40%;阿姆哈拉人是现代强势民族,占人口的30%,提格雷人在历史上曾占据领导地位,约占人口的18%。埃塞俄比亚当局曾命令必须用阿姆哈拉语授课,禁止使用其他民族语言。“厄立特里亚也尝到了这种帝国政策的苦头。但是,这种摧残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厄立特里亚操提格雷语的人以及埃塞俄比亚南部如盖拉人的文化的行为,是一个不断引起民族冲突的根源。”尽管政府是为了促进民族一体化进程,但这一政策伤害了其他民族,加剧了民族矛盾,成为后来民族冲突(如厄立特里亚的分离)的原因之一。它还摧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挫伤了各地方民族对建设一种国民文化的创造力。阿尔及利亚又在重蹈覆辙。1990年12月28日的《金融时报》报道了阿尔及利亚新的立法:“以阿拉伯语为阿尔及利亚国语,与官方接洽时若使用其他语言,将处以巨额罚款。”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法语是通用语。因此,不排除立法具有文化非殖民化的因素;然而,这一立法对该国第二大民族柏柏尔人而言,明显含有歧视因素。

在民族冲突中,强势民族经常利用宣传手段对“敌对”民族进行攻击。1990年,卢旺达胡图族政权的广播不断将图西人形容为“蟑螂”(Inyensi)或“英科坦尼”(Inkotanyi),后者指19世纪图西人的民兵组织,这一组织曾在殖民统治时期协助比利时人用暴力将胡图人置于被压迫地位。宣传目的十分明显:今天的图西人与19世纪压迫胡图人的图西人毫无区别;图西人正在计划打回来,夺取胡图人土地。这种手法在1994年再次使用。在民族屠杀愈演愈烈的6月,广播员坦率表明:他是在对“那些能听懂他的话的人”广播,即那些“农耕者之子”;并警告:对游牧者之子要当心,“保卫你

Alison L. Des Gorges, "Genocide in Rwanda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in Harry G. West, ed.,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7, pp. 123~140. 还可参见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23:2 (1995), 这是关于卢旺达问题的专集。

Vicor A. Olorunsola, e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pp. 117~119.

Basil Davidson, *Africa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8, pp. 377~378.

们的权力,起来反对那些想压迫你们的人。”这种利用媒体进行强化宣传的手段有多种形式:对“敌对”民族进行恶意诋毁,这种手法有时被称为“妖魔化”;将冲突双方的紧张关系肆意夸大,以激起本族人民的警惕;反复回顾历史上冲突双方的仇恨和敌对,对本民族进行煽动;对他族领导人进行攻击,或揭阴私,或造谣惑众。凡此种种,难以计数。

俄罗斯学者伊斯玛基洛娃曾经指出,最容易实现族际联系的是知识分子。虽然她也认识到知识分子与自身族体的关系,但对知识分子在传播地方民族意识的作用显然认识不足。知识分子既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也可以成为地方民族意识的鼓吹者。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赞比亚的卢瓦勒族知识分子摩西·桑干波。卢瓦勒人(Luvale people)和隆达人(Lunda people)均是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英、葡、比将两个民族分割在北罗得西亚、安哥拉和刚果自由国。依据英国人调查资料写成的《巴罗瓦勒-隆达人早期历史》(1941年)认为隆达人最早抵达查武马,这引起卢瓦勒人的强烈不满。桑干波于1979年出版了《卢瓦勒人及其酋长的历史》。此书犹如在当地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隆达人将这本书看做是卢瓦勒人企图夺取查武马的努力,积蓄多年的民族矛盾因此激化。双方之间出现了暴力冲突。最后,双方达成一致:隆达人开始书写另一本关于隆达人历史的专著,对桑干波书中的观点进行挑战。这将会是一本客观的历史著作吗?

独立以后,一些非洲大学专为研究非洲历史设立了很多项目,如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由历史学教授戴克主持的“贝宁研究计划”和由人类学教授比奥巴库主持的“约鲁巴研究计划”。这种由非洲人撰写的历史的最大作用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文化的非殖民化。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对非洲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微观的考察和个案研究,对非洲历史和社会的发掘是以一些地区或“部落”为单位。在那些缺乏凝聚力的国家,这些研究多少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复兴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 地方民族主义演变的外部条件

外国势力的干涉,进一步助长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其演变为国内局势不稳的重要因素,甚至导致分离。相反,在那些拒绝外国势力干涉的国家,地方民

族主义逐渐为国家民族一体化的过程逐渐消化。外国势力的干涉分为两种:直接干涉和间接干涉。

### 直接干涉

由于对主权国家的干涉违反国际法,这只能通过某一载体或某种借口来进行。对中央政权不满的地方民族往往是外国干涉势力利用的目标,而“支持民族自治”往往是干涉的借口。一直被我国学者作为“部族冲突”例证的乍得内战是一个典型。乍得位于非洲中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1960年乍得独立,1966年北部与中部出现反政府暴动,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乘势在苏丹成立“民族解放阵线”。在随后的20多年里,内战一直没有平息。直到1989年底,乍得举行独立以来首次公民投票,哈布雷当选为总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中,外国势力的插手和超级大国的干预造成局势日趋复杂。卷入乍得冲突的国家不仅有法国、美国和苏联等大国,还有多个非洲国家。仅以1983年对乍得的外国干涉为例。

1. 利比亚的行动。利比亚一直将乍得北部视为“不可缺少的生存空间”,以前曾出兵乍得,1983年又出兵支持反政府军。1983年8月8日,乍得新闻部长举行记者招待会,被俘的利比亚驾驶员被带到了会场。8月12日晚,乍得发布的公报说:乍得政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了利比亚侵略升级的情况,“乍得政府要求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其他一切国际组织和国家坚决谴责利比亚的侵略行径。”

2. 苏联的行动。1983年8月7日,利比亚高级军事代表团访苏,就乍得局势交换意见。8月8日,乍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对乍得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利比亚“来扩张它在非洲的支配地位”,并要求苏联停止干涉乍得内政。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长于

Harry G. West, ed.,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pp. 10 ~ 11, 129. 早期,胡图人以农耕为生,图西人以游牧为生。  
[俄]伊斯玛基洛娃:《现代黑非洲的民族偏执与民族一体化问题》,载《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

Robert Papstein, "From Ethnic Identity to Tribalism: The Upper Zambezi Region of Zambia, 1830 ~ 1981," in Leroy Vail, ed.,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ey, 1989, pp. 372 ~ 394.

关于文化的非殖民化,可参见李安山:《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载《亚非研究》,第4辑(1994年)。

《非统主席呼吁各国不要干涉乍得》,载《人民日报》,1983年7月7日。

《围绕乍得问题的新的事态发展》,载《人民日报》,1984年5月14日。

《乍得政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载《人民日报》,1983年8月14日。

1983年8月30日发表讲话,指责美、法“积极干涉了乍得内战,实际上使冲突国际化”,认为利比亚一直“支持乍得的民族解放运动”。

3. 法国的行动。乍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曾三次出兵乍得。1983年,法国实施了“大鳐鱼行动”,协助哈布雷政权,对反政府军进行反攻。法国的军火源源不断地运到乍得;伞兵和“军事顾问”也抵达乍得;法国政府还任命让·波尼准将为法国派往乍得部队的司令。可以说法国出兵是根据1976年的双方合作协议以保卫乍得的合法性政府,然而,捍卫法国在乍得的利益也是一个明确的目的。

4. 美国的行动。美国希望遏制苏联的扩张和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1983年7月19日,美决定向哈布雷政府提供价值1000万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美国务院表示:不采取紧急行动就会有使利比亚(在乍得)建立一个亲利比亚的政权的危险。美国两艘航空母舰驶入地中海待命,防空导弹也运到乍得。1983年8月7日,里根派遣的两架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侦察机和8架F-15战斗机到达苏丹,“将随时可用来与乍得政府和其他支持乍得的友好国家政府密切合作并肩作战。”同时,美国还与埃及等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5. 扎伊尔的行动。扎伊尔希望通过出兵赢得美国的支持和在地区政治中的角色。里根利用扎伊尔欠债8亿美元无力偿还这一事实,怂恿蒙博托干预乍得事务。蒙博托在1983年7月3日和7月12日曾先后向乍得派出250名伞兵和1750人的突击队及6架飞机。8月初,蒙博托访美时表示将再增派士兵支援乍得政府,里根对此表示赞扬,同时要求国会批准在1984年向扎伊尔提供总额为5150万美元的经济和安全援助。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双方使用的主要是外国武器,如苏联的米格飞机和萨姆导弹、美国的“红眼”导弹、法国的美洲虎飞机和“阿皮拉”式反坦克火箭。然而,进行地面战争的战士和战亡者却都是黑人。一位乍得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乍得武器本来就太多了,现在还运来这么多更先进的武器,干什么?”一位英国学者对乍得的看法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解决乍得国内目前的民族冲突需要作大量的协调努力,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排除来自外部的插足者。”

#### 间接干涉

这种干涉是通过各种手段来进行的,以经济援助为筹码,或通过军火贩卖来实施,还有的则是通过新闻

媒体来进行。这种干涉行动并非由干涉国直接出手,而是通过其他机构来进行。在有些情况下,新闻记者的报道助长了地方民族势力。这种报道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由于是现场,更有煽动性或说服力。最好的例证是英国记者关于尼日利亚第一次军事政变的报道。

关于尼日利亚1966年1月15日政变是一次对北方进行报复的“伊格博人政变”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英国的新闻媒体。1月23日,伦敦的《星期日时报》报道:“军政府领导人阿古伊-伊龙西少将持有一份包括70多名消失了的显要人物……的名单,主要是北方的领袖。”研究非洲政变的弗斯特认为:这一报道极不准确。BBC的记者舒尔兹在1月30日报道:所有的年青上校似乎均是伊格博人。这些报道加强了“东部伊格博人反对北部豪萨人”的印象。弗斯特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策划政变的军人中有约鲁巴人阿德莫耶加上校,他曾是约鲁巴政治组织“行动派”的领导者。政变领袖恩泽古虽然出生在伊格博地区,但以北部为家,说一口流利的豪萨语,其朋友也多为豪萨人。弗斯特认为,政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权者的普遍不满。政变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更谈不上建立伊格博人统治的政治目的。他指出:“一月政变并非一次为了进行部落统治的伊格博人政变。它是一次由普遍的政治不满激起的政变,却缺乏一种与统一进步大联盟(UPGA)或其他政治集团的直接联系。”

十分明显,人们对政府的腐败以及地方党派无休止争斗的不满,是政变的重要原因。用“伊格博人政变”来概括一场由几位满腔热情的青年军人发动的政变不仅极不恰当,而且颇具煽动性。6个月后由北部军事长官发动的政变和随之而来对伊格博人的大屠杀正是在这种借口下进行的。由于尼日利亚一月政变在非洲独立后第一批政变中颇具代表性,这种用“部落主义”来解释一切动乱成了一种时尚。对于这种“万金油”式的解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受到了政治学家的批

《扎米亚斯指责美法干涉乍得内政》,载《人民日报》,1983年8月22日。

《美国宣布向乍得政府提供紧急军援》,载《人民日报》,1983年7月21日。

《里根派遣空军支持乍得反对利比亚入侵》,载《人民日报》,1983年8月9日。

转引自欧玉成:《乍得前线行》,载《人民日报》,1983年10月4日。

[英]G.阿希沃兹:《当前乍得的民族冲突》,载《民族译丛》,1986年第2期,第20页。

Ruth First, *The Barrel of a Gun: Political Power in Africa and the Coup d'Etat*, Penguin Books, 1970, p. 300. 关于此次政变的资料主要引自他的著作。

评。波斯特和维克斯曾在他们分析尼日利亚政治的著作中指出:这种用“部落主义”解释一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 国家政权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前途

在一些非洲国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政权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发挥。国家政权的滥用和国家政权的削弱均可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加强。

### 国家政权的滥用

人是社会性群体,归属于各种血缘群体、民族集团、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并从中找到了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政权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是政权存在的合法依据。政权通过各种国家机器和法律来保护公民的各种正当活动。然而,在一些内聚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法律的非道德性使一些地方民族的基本权利遭到损害。有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歧视甚至仇杀丝毫未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这种在国家法律庇护下对本国公民实施伤害的行动必然为被伤害的民族所不容,它们有两种选择:力图推翻这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政权,这是一种主动积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着现政权的支持者,民族冲突在所难免。还有一种消极的选择——退出国家保护系统。在后一种情况下,地方民族或以地方民族为基础的政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的替代者。

### 国家政权的削弱

赢得独立后,非洲民族主义那种急功近利的缺陷性开始表现出来,反帝反殖的号召难以继续作为动员人民的工具,各民族集团开始以人们熟悉的组织方式重新整合政治力量。由于阶级关系不成熟,地方利益或地方民族利益成为了重要的整合工具。地方民族主义在有的国家未形成气候,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变得难以控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人(或集团)的品质和能力及相应的政策。一些领导人超越地方民族的远见和政治智慧将国家引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民族建构稳步进行。在另一些国家,由于政治机制不成熟和游戏规则不确定,权力成为敛财的工具,贪污腐败成为时尚。这往往引起一些较有分量的社会集团(如军人)的反感。军事政变必然使国家的正常运作遭到破坏,使地方民族意识增强。

一旦国家的保护职能不完全或不存在,公民即失

去对国家的信任。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或依靠宗教与巫术,或借助民间组织或现代组织,更多的则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传统习惯上更易于接受的地方民族势力。如果阶级意识不发达,地方民族意识理所当然地成为反对党的滋生土壤。这为政治领袖提供了新的舞台,他们利用大众寻求保护的心理,通过各种许诺来寻求支持,从而推动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

综上所述,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可以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分离主义。当民族矛盾不可调和时,地方民族主义者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分离的目的。这在独立后的一些非洲国家出现过(尼日利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成功实现分离的只有厄立特里亚一例。

第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民族互相争夺领导权。地方民族矛盾不断引发冲突,以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民族因长期生活在一起,通婚现象增多,加之居住混杂,分离已不再可能。这种情况在大湖地区比较明显。

第三,地方民族主义追求的是权力分配中的恰当份额,而不是为了分离出去。由于各种因素,有的地方民族在利益、机会和资源享有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它们希望得到一种公平的待遇。换言之,它们要求的是公平地位,而不是退出或分离。津巴布韦等国属于这一类。

第四,地方民族矛盾被逐步解决,国家民族一体化顺利,地方民族融入了国家民族。这种情况最为理想,坦桑尼亚等国似乎属于这种情况。诚如俄罗斯学者伊斯玛基洛娃指出的那样:“现代非洲一体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民族发展中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具有特殊作用。”

[收稿日期:2001-01-05]

[修回日期:2001-02-10]

[责任编辑:谭秀英]

Kenneth Post & Michael Vickers, *Structure and Conflict in Nigeria*, 1960-1966, London: Heinemann, 1973, p. 11.

关于坦桑尼亚的民族政策,可参见葛公尚:《初析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周泓:《坦桑尼亚民族过程及其民族政策》,载《民族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关于非洲民主化后坦桑尼亚的民族政策,可参见 Harvey Glickman, "The Management of Ethnic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anzania," in H. Glickma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tlanta: The ASA Press, pp. 289-309.

[俄]伊斯玛基洛娃:《现代黑非洲的民族偏执与民族一体化问题》,载《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第26页。